近世日本汉文学的特征以及日本汉诗在其中的位置

近世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是和儒学者密切相关的。儒学者首先是近世日本汉文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主力。绪方唯精和猪口笃志的《日本汉文学史》都视近世日本文学（由于文学史分期上的差别，这里具体来说指的是近世日本中的江户时代）为“儒者文学的时代”。其次，“儒学者”，其志业并不以文学为专一，而是以经学研究为主。因此，近世日本汉文学又和那时代的经学研究关系密切。

近世日本汉文学所涉及到的文体，除了诗文以外，近代的日本汉文学史家亦注意到汉文日本正史的编撰。作为六国史收官之作的《日本三代实录》成书于延喜元年（901年），至宽文十年（1670年）间，未出现一部汉文日本正史。而修撰国史的任务，也是由当时著名的儒学者进行的。林罗山父子为中心编撰的《本朝通鉴》以及水户学者为主体编撰的《大日本史》是这期间最重要的两部史书。

为什么将史书纳入到汉文学史的考察范围？一个原因是，这些日本汉文学史都是以作者为纲要的，因此，在儒学者沟通了近世日本经、史、文研究的情况下，对其中任何一个门类的省察都无法脱离作者这一符号所指的整体语境。

但这仅仅是一个较为表浅的回应。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汉诗、汉学、正史，这三者所共同构建的“日本汉文学”，其所要强调的是什么？是汉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这种日本汉文学史的结构中，日本汉诗在近世所达到的高度——内容广泛、技巧纯熟——是儒学者汉学素养的一部分，其美学特征并没有被独立出来。